

V287.01

西安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8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渭华起义失败后九年征途中

我的亲历亲闻 (1930—1938)周益三 (1)

长安地下党活动的两个据点

——秦岭小学 房庙小学刘崇英 (15)

※ ※ ※

陕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田景福 (20)

西安市天主教开展“三自”运动的前前后后高宗才 (25)

※ ※ ※

我所知道的民盟西北总支的成立与活动

.....马文彦遗稿 贺志云整理 (29)

杨虎城将军与“西安绥署步兵训练班”何永安 (34)

抗战时期漫协西北分会述略周克难 (42)

※ ※ ※

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之战师临先 (49)

被军统控制、带有宗教色彩的——华北督导团李俊才 (60)

※ ※ ※

二十世纪初期陕西的宏道大学堂杨汉名 (76)

鲁斋书院的兴起和没落黄云兴 郭述贤 (87)

西安培华女子职业学校始末王君毅 (89)

抗战时期的私立西安力行中学 鲍廷枕 (103)

私立西北中学的今昔 马作骏 (113)



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奋战不息的董林哲先生 成继昆 (117)

剑南豪情樊川句

——记陕西师大教授、诗人曹冷泉 翁维谦 (124)

王子元先生的一生 任志竞 (127)

王子元先生在青海 陈秉渊 (132)

由小钱庄学徒到金融界名流

——记经春先先生 俞承淦 (134)

国民党战时第一保育院与王陆一、王秀清兄妹 李惠民 (139)



旧西安的交通工具 党 军 (143)

旧西安的典当业 叶启贤 (147)

解放前我从事银行工作的见闻 黄拙天 (153)

协盛域纸店是怎样经营的? 晋震梵 (158)

解放前的西安酿造业 叶启贤 (163)

“珍珠泉”浴池与焦藩东 葛晋卿 (166)



胡景翼通过康心孚会晤李大钊一说的质疑 木 桥 (172)

渭华起义失败后

九年征途中我的亲历亲闻

(1930—1938)

周益三

1928年，我参加了渭华起义军，在华县高塘、渭南箭峪一带被冯玉祥部宋哲元大军压过秦岭；在洛南保安镇，又受李虎臣部方少海、丁增华等五个残旅的围攻。为了保存革命武装力量，刘景桂、许权中被迫在兰田的张家坪易帜，改编为陕西南路军第三师第九旅。第三师师长刘文伯与许权中有旧，给许以第九旅番号，许于1928年8月23日（农历7月9日）率部抵达河南邓县，翌日下午，被该县地主武装红枪会追围于县东40华里之汲滩镇湍河西岸，战斗失败。在拼搏中团长尹耕莘腹部被红缨枪戳破，肠子流出，卧地不起，许权中颈侧亦被红缨枪戳透，鲜血直流，坚不退走。事后，杨晓初、许权中去上海，权中后又赴苏联留学，赵保华在河南某地教书，刘继曾不知何往，我匿藏于新野西石羊岗农民家里，待乱战略静，才乞讨还乡。

在阎、冯倒蒋战争中

1930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联合讨伐蒋介石，建国豫军樊

钟秀，被阎、冯任命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在许昌郊外被蒋军飞机炸死，遗缺由邓宝珊接替。邓报请舒玉章（共产党员，后到中央苏区任某军参谋长时牺牲）任参谋长，葛霁云（共产党员）任秘书长，杨晓初任军需处长，杨可均任郑州办事处主任。冯玉祥准备给邓拨步枪五千枝，邓、舒、葛、杨商定，用这些枪枝建立一师新军。邓函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帮助张德枢、任警斋、段泽青召集在陕旧属，葛杨也叫陕北李象九旅长率部来许昌。6月，李象九同阎揆要、任启明亲率两团抵和尚桥，冯正李象九为暂编第三旅旅长，曹瑞麟任参谋长，阎揆要任参谋主任，任启明任副官主任，王超北任军需主任，任耕三任手枪营营长。我和刘宗向于6月下旬回陕，将张、任、段募集的徒手兵集合于朝邑，转送郑州。

约8月下旬，杨晓初率八、九百人，赴新乡领枪。适黄河铁桥被炸，遂经太行南麓垣曲到达新绛，沿途还收了些散兵。冯任杨晓初为第一团团团长，属张自忠军的张遂印师。1931年2月，杨晓初经候马到绛县，察觉师长张遂印阴谋投蒋，遂率部缴了他的枪，杀死张遂印。这一仗，营长李玉玺、连长张汉泉战死，部队移驻运城。地下党员从内部得悉，冯以该团有赤化色彩，密令冯治安设宴诱杀杨晓初，幸经任启明将他带出，化装逃往平遥刘允臣先生家才免于难。杨走后，冯派李华峰接收了这个团，改编为营。韩钟麟、任启明离该营回陕。杨可均、杨晓初去上海。

杨晓初是北大学生，我党的早期党员。1925年在三原渭北中学任教，大革命后党在地下时，他做上层统战工作和兵运活动。多次为创建党的武装力量，呕心沥血，对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随严云僧团进入西安

1930年9月，杨虎城将军率十七路军赶走冯军，进入西安。

我随严云僧团进城，寄食该团。在街上偶遇纪子中（共产党员、黄埔同班同学），他约我帮他筹建完兵营，我慨然答应，但报请我任连长未准。后来，严云僧因奉命赴西府剿匪，要我去麟游与赵伯经联络。赵系共产党员、甄寿山旧部，又是麟游人，有武装数百人。严不愿向赵用兵，找我去麟游与赵相约：严兵来，赵兵走，严兵走，赵兵回。就这样按约办事，时近半年。我在麟游曾建议赵伯经树起红旗。他认为时机不到，自己力量太单，有被消灭之险，表示缓时再说。是年秋，王泰吉成立骑兵团，找云僧转告我回西安，已报请我当骑兵连长，但过了多时，仍未批准。不久，邓宝珊接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职务，驻陇东西峰镇的新编十一旅旅长石子俊，愿意给邓五百徒手兵，葛霁云请示了邓，派我去接。我去石旅住了一个多月，一再交涉等待，总是不得要领，无奈只好回西安交令。

赴兰州驻甘行署

1932年2月上旬，我与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幕僚及青年学生约500人同行赴兰。这些人中，有续范亭由山西带来的一些军官，有邓宝珊先生的旧属，有各方面介绍来的青壮年知识分子，当时学生在学校毕业就是失业，所以多来行署谋求出路。同路的党员有：周凯、周志学、李特森、陈云樵、田又勤、任士杰等人，走了20多天，才到达目的地。分配我到参谋处当参谋，党员同志去教导队当学员，陈云樵任教导队教务长。

在兰州，我还认识了好些党员，其中有：常黎夫、孙作宾、马豫章、崔振山、李慕愚、贺修之、杨嘉瑞、杨子实等。1932年上半年，中共皋兰特别支部成立，常黎夫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常黎夫住三条石街杜斌丞公馆，我常去他那里，还在那里寄存过印刷品。这年秋，行署派教导队去平原，接收西安绥署发给的五百支步枪，常黎夫和我计划，教导队把枪拿到手，由党员周

凯、周志学、李特森发动起义，将起义队伍带到六盘山迤北固原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教导队领到枪后，西行夜宿蒿店起义。部队刚走出该镇西口，就被队长李华峰发觉追来，周凯，周志学战死，李特森、田又勤等弃枪逃走，一部分非党队员被追回，起义遂告失败。

同一时期，在靖远县驻防的王子元和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教导队工作的苏士杰（北大学生，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李维平（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吴景鳌等领导的起义又告失败，三人逃回兰州。苏、李在南门外一僻背小店小住数日，去了河西走廊马仲英部。不久，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吴景鳌与邵是同乡，遂到甘肃省政府供职。

这时，葛霁云由西安来兰州，密住短时，去了马仲英部。本来，邓宝珊主任在西安时决定葛为行署秘书长，但被人密告他是共产党，秘书长的职务遂被王新令抢去了。

是年冬，甘肃成立中共甘、宁、青特委，吴鸿宾任书记，常黎夫任秘书长，马豫章任组织部长，李慕愚任宣传部长，孙作宾任特委军委书记。1933年初春，孙、李去靖远巡视新创建的靖远游击队（对外叫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是王汝霖，政治委员李慕愚，共有两个大队，近300人。第一大队队长杨得胜，第二大队队长吕振华。当时我在行署参谋处看见一份国民党三省联军围剿游击队的电报，内说俘虏要员20余名，将于某日解往兰州。我即按时到兰州西门内坐等。押解被俘人员的部队进城后，其中能认识的有孙作宾、李慕愚，我立即从各方活动营救他俩，但均不得要领，急将实情告知挚友刘奉学（行署少校参谋），请他鼎力设法。他是国民党中委刘允臣的儿子，曾留学苏联，拥护赞成共产党。刘告诉我此事交给他办，不必再找别人了。过了几天，他给了我一个纸条，要我到省府后院西边大庙内找一人，将纸条交给他就行了。我按地址找到那人，那人看了纸条，二话没说，就将孙、李二人由关押处安排到省政府大厅西厦去住。后来我问刘

奉学写条子是什么人？他答是现任甘肃烟酒税务局局长仲兴哉。孙和李虽然被释放了，但他俩穿的衣服太不象样子，不能上街，我买了两套新衣和刘一道亲送住处。他俩换了衣服，同路出省府门，分道他往。游击队被俘人员除孙、李外、全叫国民党杀害。

参加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将军于1933年4月在张家口树起“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旗帜，5月26日正式电告全国，宣布就任同盟军总司令职。甘肃行署参谋处长魏自愚告诉我，他要去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他岳父张励生现任同盟军骑兵军军长，如有可为，电我即去。不久我又接杨晓初信，也叫我去察，并嘱我到北京找某旅馆有人接头。这时，适有甘肃行署高参刘霭如乘车回临潼，我即乘他的便车到西安，不久，又和刘奉经同到郑州，宿刘允臣先生公馆。我向刘老说明了我的去向，刘老说：你去我不阻拦，奉经是我的侄儿，不能由这里去张家口，以免特务告密，我遭到责难。这样，我只好独去北京了。到北京，我到指定旅馆，见到在北方局工作的景瑞卿，他是专接待各方去察人员的，向我介绍了同盟军的情况。说许权中部编为第十八师，驻某街。我于6月中旬到达张家口，见到了许权中、杨晓初、杨可均等人。当时杨晓初是该师参谋长，庞志杰是军需处长，雷钦若（荣）任书记，翟文凤任政治部主任，我当参谋。师部特务连有数十名战士，多系北京和各地具有大、中文化水平的青年，有些人还当过下级军官，是个预备军官连。杨晓初让我给该连拟了一个短期军事教育计划。十八师当时只有番号，并无战斗部队，我在该师约待了7天，就被调到宣化县南山口的左卫镇骑兵第十六军李忠义部第一师师长柳挺庭部去当参谋长。这个军有三个师，第一师力量较强，约有马五、六百匹，一人一枪一马，第二、三师共有马一百余匹。军师部无健全

的幕僚组织，只有少数军需、副官、秘书等，是最轻便的部队。第十六军一切决策性行动，多由第一师师长柳挺庭决定，这大概是因为他有实力的缘故吧。

6月下旬，在张家口召开军民庆祝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胜利大会。到会同盟军号称20万，实际最多不过七、八万人。各种番号的部队都有，甚至还有打着长方锦旗，上书某姓大字的保旗兵，有一部分是东北义勇军。大会由张允荣主持，冯玉祥先生讲了话。

8月14日，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压力和围攻下，宣布解散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自己到山东泰山“休养”去了。抗日旗帜仅存在四、五个月的时间，就被取消了。上海抗日救国会朱庆澜先生，曾给抗日同盟军捐过大批军费。当张家口部队转移到张北时，前委在那里召开了扩大会议，阎红彦、谢子长二人力主西进南下，将部队拉到绥远河套，俟机再到陕北；前委也认为可以在绥远休整一个时期，借机扩大军事力量。后又认为，由河套去陕北与抗日之名有违，不同意阎、谢的主张。在我调离十八师时，阎红彦即由孙殿英部弄来一连骑兵，用来作为保卫前委主要人员安全之用。前委和师部人员骑的马匹，多是该连的。

8月15日，骑兵第十六军，由宣化移驻万全县北约250华里之公会村，在土城子总司令部召开师参谋长以上军官会议。方振武、吉鸿昌、张慕陶在会上讲了话。分组讨论的结果，意见是：一、军队不能解散；二、军队番号改为“抗日救国军”（原方部称抗日救国军、吉部称抗日讨贼军），方为总司令，吉为前敌总指挥；三、西去河套，屯兵养马，待机东进抗日。张慕陶是我在这里首次见到的，休会中间我问张：“你是张慕陶？”他神秘地把右手三指一捏，扭头走了，令人不解。传说张是托派，后被前委开除党籍，投靠阎锡山当了参议。张这个人喜出风头，会出点子，口如悬河，善于鼓动，有领袖欲。1937年冬，他另起炉灶，

搞了个“工农党”，还印有纲领。十七路军529旅，由忻口退到离石县交口镇，副旅长贾振中原系抗日同盟军第二师团长，因第二师西走商都，后东进独石口没有来，归了宋哲元，全师党员负责人被前委开除了党籍。张慕陶和贾振中在汾阳冯的军官学校共过事，是熟人，在张来离石县时，贾去看望张，拿回了“工农党”纲领，想在1057团建立该党组织，我将纲领交党领导，遂与贾开展了一场斗争。解放后，贾在河南民革负责。曾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不是中共党员。

庞志杰对我说，“西安事变”张、杨发出八大主张的通电后，张慕陶很快由山西太原来到西安，自称是阎锡山的代表。他来时，路过邵阳、韩城，到西安后他就对杨虎城说：把蒋介石杀了，如国民党军队来攻，韩、邵一带，有十万民兵可作后盾。大家听了他的话都笑了。有一次庞志杰因工作到新城杨虎城的办公处，又遇见了张慕陶，庞对张说：“你又跑到这里来胡吹了”。张打了庞一掌，即避开了。庞志杰1938年夏在汉口第十七路军办事处工作时，在武昌遇见金闽生，金说1938年张慕陶不知怎么同军统特务拉上了关系，但因胡言乱语被军统特务在陕西枪毙了。从此以后，再未听见张的消息。

约9月初，前委柯庆施、刘少文、邹春生等在公会郊外田野开工作汇报会。我说，柳挺庭的师部有个崔秘书（共产党员）秘密告诉我：宋哲元部萧派瀛派人来，要柳师长投靠宋，将部队移驻张北县。我遂乘机鼓动柳坚定西去商都后到河套，充实部队以待来日。若投靠宋是要受杀身之祸的。柳说萧不会杀我，萧的妹子是我的老婆，把我杀了，他妹子没有男人了，要当寡妇。柯庆施听了我的话，很不以为然地说：“你回去再做做鼓动工作”。几天后，总指挥部来令，派武止戈为骑第一师参谋长，我调该师参谋处长。约9月10日左右，总指挥部命令骑十六军拂晓开赴商都县，而当日下午柳师长即下密令，提前开赴张北。是日下午

张性初（总指挥部报社社长）来公会住在我处。夜半，突来一士兵说：“师长请你去”。我刚坐起，那个士兵就从我肩上卸去手枪，并说，“你不用去了”。我对性初说：“看来情况有变化”。我说完话，急去师部，看见大门前有一串捆搭好行李的马匹，二门外椅子上绑着张团附（东北人、共产党员），我走进师长的卧房，柳和武止戈还在炕上睡觉，我问柳发生了甚么事？他握我手低声说：“对不起，我已给刘少文50元，你们分作路费自便吧”。我回头出门时，碰上该师团长、连长等五个人进门，高呼师长起床。柳问干什么？众呼到张北去。柳答张北我不去，我要去商都。只听得盒子枪出套声，一时那五个人把柳架出门扶上马走了，连被绑的那个张团附也不见了。我回住处向张性初谈了经过，上房瞭望，看队伍走完了，我俩才出公会土围子西去。下午赶上了十八师，见村东路旁枪毙了3个人，说是鼓动部队哗变的。见了许权中谈了情况，第二天向西进军。我是单干户，多随老熟人马子敬走，看他的行军行列，最多不过七、八百人，杂伴枪约四、五百支，子弹不多，运输工具是小铁轮车，适值下雨，行进颇慢，三天后在西草地停止待命。这时石仲伟送来北方局命令，将部队开到京西门头沟及太行东麓一带打游击并建立根据地，以牵制南下的国民党军和第三次围剿江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部队。前委根据北方局这一命令，遂决定东进南下向北京前进。阎红彦、谢子长因前提意见没有被采纳，不给他俩分配工作，只令随军行走，故尔后阎、谢经由山西回到了陕北。此时，从屯垦青海的孙殿英部起义而来的刘振远（刘是党员）团，虽兵力不足两个营，但武器装备较好，人各有枪一支，子弹满袋，每连还配有轻机枪3挺。总指挥部给刘以第七军番号，下辖十八师。十八师共有两个团，马子敬为第一团团团长，刘振远部徐某编为第二团团团长，两团约共有兵力1500多人。刘振远任军长，许权中任副军长兼十八师师长，刘少文为政治部主任。十八师官兵认为这样安排

不公正，但许权中不介意，亦未形于辞色。东进独石口途中，调我任第七军参谋长职，军部未设职能机构，也无幕僚，仅有一主官，简单的很。部队行宿都由我亲笔下达命令。东进沿途，攻打一个天主教堂的土围子，莫费吹灰之力就攻占这个小城，缴获了教堂内藏的粮食、武器及急需物资不少。事后，许权中对我说，我们的部队能打小仗，就能打大仗。在围子里有件小趣事顺便提一下：爱吸烟的人长时间没见过烟卷，真是如饥似渴，教堂内发现了一批黄牛毛丝包烟，烟鬼一见大喜，于是我也过了个老瘾。行进到独石口，在那里休息了几天，这时决定经镇安堡南下攻打北京城，但这一带尽是山路，崎岖难行，有时在长城顶部盘来盘去，路窄而且多系截脚的小石子，有时下山是小河，在水中旋转行进，一道山湾两道河，人的鞋底磨透了，马蹄脱铁了，到怀柔县给马钉了掌，夜宿明十三陵，我们没有携带给养炊具，遇见什么就吃什么，沿途主食是落花生、红薯、荞麦面，还吃过一次无调料的羊肉。第二天，约9月下旬，出东山口，许权中师长率马子敬团向长陵的西北明定陵国民党驻军作侧方掩护，占领了昌平县迤东地区，在这里才吃了一顿高粮长面。还有两件事，顺便提一下：一件是方振武部两个师投降了国民党；二是宋文梅奉命去承德迤西某地动员汤玉麟共同打北京，汤满口答应，但不行动。据宋谈、汤本人头戴大清红缨帽，脚登朝靴，完全是一个老封建官僚、老滑头、老保皇派的样子，让这样的人跟我们一起打北京，岂不是笑话！

攻打小汤山

北京周围国民党军和日本军部署如下：黄杰第二师驻南苑，关麟征第二十五师驻北京城内和东郊，商震部驻京西，万福麟部驻京北，庞炳勋部驻南口，宋哲元部驻怀来迤西。日军驻高丽营、牛栏山。小汤山由万福麟部驻守。我军出山略为休息，于某日

午夜后开始攻击小汤山，正面是方振武的卫队营“黄裤衩”，左翼是第五师、第十八师，右翼记不起。拂晓，督战战韬（原东北抗日将领）来前方督战，在前进中被敌步枪弹从交档穿过，抬送东山口，与世长辞。他没有军队，只有五、六十名卫队，年轻健壮，每人长短枪各一支。后来前线督战即由许权中担任。前进指挥所设在葫芦河村内，方、吉、许都聚在这里，迫击炮弹不停地落在指挥所周围，很不安全，遂移村西边沿，每人各背门板一块，躺在院子里听战况。方部“黄裤衩”因向正面进攻，又在开阔的水稻田里，伤亡很大，但当日傍晚终于攻开了小汤山。我们忙了一夜，将敌存的面粉及军需物资，全部运出。有些战士穿上了新鞋，还开了个庆祝会。第二天拂晓，敌向我猛扑，我军向东北方面撤退，抵妇人新庄，东去是高丽营，为日寇盘踞，我们无法再退。这时吉鸿昌将军右袒提刀，大喊集合，将大刀猛插地上，讲了几句话，高喊“跟我来，杀！杀！杀！”，一拥向前，将敌赶出十里之外，总司令部进了北山，驻明十三陵迤东地区，队伍分驻山里和妇人新庄，第十八师驻顺义县属之三家店。前委和方、吉密商军队行动，决定不打北京了，也不去太行东麓了，枪枝交国民党军，以保存革命干部，并派总指挥部参谋长崔拱琛（陆大学生）和第五师副师长陈天秩为代表，于1933年10月上旬与国民党军将领商震接头，并由商牵头组织有关军方参加，举行会议。内容保密，很多人不知究竟。就在这时，忽然吹出一股风，说“山东韩复榘派石友三率部队接我们来了！已抵河北省保坻一带”。我军开赴顺义东渡白河，几个高级将领们坐在白河堤岸上，声称水深，不能徒涉。方振武的卫队中有不少个白俄，都是大个子，也不令下水试涉。队伍只在周围疏散隐蔽着。面对此情况，我纳闷了，回想上前天庞志杰、杨可均离开部队去北京，还是从白河徒涉的，可见河水不深，但为什么现在却望河兴叹不渡呢？我真不解。约下午二、三时，命令部队返顺义西某村宿营，这时事态严

重了，日寇飞机、炮弹从空中、北边打来，南边西边步枪声也不断向我军射击。距顺义县城偏西北约四、五华里的道路旁有一独立大树，武止戈骑匹大白马，停在树下，敌机以此为目标投弹，武当场毙命，后来把尸体掩埋附近岔道三角地里。我和刘振远骑马并行，刘大骂“谁把咱领到垓下，现已成四面楚歌，从哪里能突围出去呢？”等到夜幕已垂，我们才摸到一个村子驻下，奇怪的事突然出现了，第二天早晨，刘振远、许权中、马子敬等带兵的几个主官都不见了，连他们的护兵也找不到，究竟那里去了？我还在狐疑，忽接崔拱霖来函，大意说：主要领导离开了，队伍要改编，第七军给你编一个团，原团长以下及书记皆不能走，速将你军人员、马匹、枪支造成清册限三天交指挥部。我是一个幕僚人员，又是共产党员，那能这样做呢？约在第五天晚上，国民党第二十五师第七五旅参谋长姚国俊、副官处长袁学安，还有好多随员来我部收枪、遣人。姚、袁是黄埔四期同学，是熟人。姚见我就问：“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答：“抗日吗！”袁学安派副官把我送到前进指挥所，交给了旅长张耀明。我作为阶下囚被问了几句话，就背着床板大睡了。第二天袁备马派兵把我送到北京朝阳门外。我找到富平会馆，可惜袋中已一文不名，恰好雷钦若（荣）也到会馆来了，他是富平人，通过他的关系我才住下。打听到杨晓初住段泽清家，晚间去要了20元，到旧衣市买了一套寒衣，算度过了难关。晓初介绍我去焦作警察署程蔚璋家住了月余，又到彰德住韩述之办事处。1933年12月中旬，我持晓初给王菊人的信，请在西安绥署给我设法安排一个工作，有事干就行。我还找崔孟博从中斡旋，往返数次，回答是无地可容。凑巧在钟楼西偶遇张性初，谈了情况。他说：“咱们可到汉中张汉民警卫团，王超北是该团军需主任，他定于1934年元月4日由汉中用团部驮骡来接送物资，正好随同前去。”我决定后，即回家一趟，按时来西安乘车到了宝鸡，徒步赴勉县诸葛庙，在该团作客11个

月。我向张汉民告辞，他坚不让走，并于12月派我去第一营当连长，但遭到营长崔启敬的拒绝，他改任营附后，我才到了差。1935年4月，部队在柞水九间房与红军作战失败，杨虎城将阎揆要部改编为特务第二团，调驻西营房。5月王超北从上海托运50瓦电台一部，阎令我从火车站提运团部，租民房密存，我接来农村老婆李桂兰居住掩护看守。当时西安特务如麻，处处都要小心。10月，由雷展如、李更生送到陕北交给党中央。

7月上旬，红25军出子午峪，威逼西安，人心震动。西安绥署令特务第二团前往户县阻截，红25军在子午镇——泮峪口之间活动多日，约于中旬经余下、耿峪西去，我团遂返回西安。

1934年12月，姜旭初由汉中来西安，在陕西省委工作，特务跟踪追捕，他骑自行车跑进西营房，在特二团避了几天，于1935年冬进入陕北中央苏区，不幸被康生杀害了。

1936年元月，特务第二团调驻淳化县，我当二连连长，阎揆要命我守卫北门并交我一任务，城门钥匙由我掌管。对我说：“夜间有人叫门，用电话通知我，亲来迎接，你不要和来人对话。”事后我才知道，原来1935年10月汪锋曾持毛主席给杨虎城将军和杜斌丞先生的亲笔信，由瓦窑堡到西安，将信交杨并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并达成几项协议。任务完成后，杨委托王世英以西安绥靖公署高参名义亲送汪锋于1936年3月返回了陕北。汪、王去陕北，均路经淳化县特务第二团防地，所以阎揆要对我有此叮咛。在此，顺便将王世英的来历说说：汪锋10月到西安，将毛主席的亲笔函给杨虎城将军后，杨主意不定，派崔孟博到天津找南汉宸商量，南以华北局代表的名义，派王世英到西安，向杨转达他的意见，并协助汪与杨会谈（王未出面，只向杨转达党的意见），杨派王菊人与汪会谈，达成协议，在汪返回陕北时，名义上是杨派王送汪，实际上是代表他本人向毛主席表达他的意见。汪在西安住军法处内，由额外军法官庞志杰（中共党

员)安顿住处。汪、王二人在西安的安全工作由庞一人负责,并由庞护送他二人去陕北。这年4月我团调驻白水县,张一平来团任团党委书记。在这个县,揆要清理了团内部一些不可靠分子,该礼送的不伤情面送走了,有些借故开除了,团内基本情况很好。12月12日拂晓,忽接绥署电,张、杨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令我团轻装星夜赶赴渭南赤水镇阻击西进之敌。200多华里路程,我团走了一天一夜,于13日晨到达目的地,立即在北起渭河南岸至赤水原西沿阵地构筑工事,面对中央军董钊师。周恩来副主席指派汪锋到渭南协助阎揆要,并带有指示信,要阎团坚决拥护张、杨八大主张,抗击国民党中央军于一周内不使迫近西安,以便有时间对蒋开展工作,逼蒋抗日。我团在赤水协同友军完成了这一任务。

约12月20日又调我团赴兰田县之刘峪口阻击敌人。中央军董钊派一个挑担卖落花生的人,送给阎揆要一封信,询问阎对事变的态度,企图使阎归蒋反杨。阎看后遂将信交给党组织,并去信教训了董钊,要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日寇侵略,国家民族危急,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937年3月,汪锋来耀县,在许权中独立旅政治部任职。在保安时,中央明确指定汪全权负责西北军党内外工作。

许权中是中共早期优秀党员,在西北地区是人所共知的。史可轩1925年在河南胡景翼部任旅长时,许是他的营长,国民二军失败后随田维勤部驻河北涿县时,与李大钊发生联系,李指示他脱离田部,从南口进入内蒙五原一带,屯兵养马,以待时机。1926年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在五原誓师,解西安围,组织西北联军,出潼关在中原与北伐军会师。许权中率军经陕北到西安,奉命组织保卫部,任队长。他忠于共产党,曾参加潼关原起义和渭华暴动。在洛南防地镇压了恶霸何豹子,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东进途中,杀了地方大恶霸,受到了群众的称赞。他是我党智勇双

全、能征善战而且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向党中央陈述已见，中央认为正确，送他赴苏联深造。西安事变前，杨将军秘密地把他请来西安，任他为副旅长，12日夜半，部队攻打警察局，久打不下，杨急指定许去指挥，他身先士卒，一攻而进，拿下这个局，杨将军颇为满意，委任他为绥署独立旅旅长，辖特务第一、二两团。事变和平解决，独立旅进驻耀县，依据周副主席指示，在许权中、阎揆要、汪锋、方仲如等人具体安排下，将该县大恶霸反动透顶的武装土匪头子雷天一枪毙了。雷天一在耀县无恶不作，称王道霸，不断截留、扣压北上延安的进步青年和民主人士，扣留红军往返延安的物资，对南北来往人员多方刁难。枪毙雷天一，既扫除了南北人员往来的障碍，也为人民除了大害。1934年春将王秦吉解送给陕西省府，以致王被杀害在西安，就是雷干的。

西安事变后，贺龙司令部驻富平庄里镇，我受阎揆要之命，派第二连年轻士兵30名，去贺总文工团学习话剧、歌舞、活报剧，返回后成立了青年剧社，在耀县给我团官兵及群众演出，颇受欢迎。但有人却说这些剧是宣传共产党的，不让再演。由于旅、团长的支持，直到1938年冬阎揆要经党中央调离十七路军后，被国民党反共势力强迫停演，才收场了。第二连官兵与国民党政治指导员为演剧作了不懈的斗争，终因无上级支持而寿终正寝。1939年4月，党令在1057团特别是第一营的一些暴露党员面貌的人退出该团。这些人陆续进入陕北边区。全国解放后，这个团的士兵党员，不少人当了党的干部。如陕西省第三机械工业局局长高军、空军第十一军副军长陈汝义，甘肃省运输总公司经理胡虎林（康群），省建六公司党委副书记张天绿，沈阳阜新市市长黄永德，中央军委测绘学院副院长张戈，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副院长王元明，西安制片厂导演高鲁手，河南军区副司令彭辉，西安解放饭店副经理姚寅武等。他们在党领导下，在不同